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7年长篇小说:

# 行动与命运

□岳 雯

据说,奥尔巴赫在《摹仿论》里引用圣约翰·欧文在《莎士比亚全集》里的序说,“在这里我们要谈谈古希腊悲剧和伊丽莎白时代悲剧之间的巨大差别:古希腊悲剧是一种人为安排的悲剧,人物角色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他们的角色无非是按照为它们安排好行动去死。然而,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则是直接源于人的内心。哈姆雷特就是哈姆雷特,并不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神迫使他走向悲惨的结局,而是他内在的气质使得他别无选择,只能走向这种悲惨的结局。”我理解这位批评家的意思是,古希腊悲剧的是行动,而对莎士比亚来说,重要的是人的内心。之所以曲里拐弯引用这一番话,是因为坐困书斋的我欣喜地发现,2017年的长篇小说,被铿锵有力的行动所主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个时代,或许人人也仍然还是哈姆雷特,但是,至少在小说中,这些哈姆雷特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的行动并非出于某个不靠谱的精灵的授意,而是完完全全来自于他们的内心。行动富有激情,行动承载思想,行动决定命运。在长篇小说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行动的力量所打动,在文字中与行动共情。

## 行动即正义

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面对陈海的死亡,天然就具有了行动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从政治秩序的角度看,侯亮平负有重新修补破损的政治秩序,令其重新回复坚固和清洁的职能;从个人情感角度看,作为陈海的同学、同事和好友,侯亮平有责任为其报仇,并完成他未竟的使命。事实上,行动并不是一个人的行动。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政党声势浩大的自我净化的行动。侯亮平的行动,是这个政党行动的戏剧化、文学性的表现方式,所谓“道成肉身”。而行动的依据,恰恰来自于小说的名字——“人民的名义”。读者也好,观众也罢,绝不会将侯亮平的故事仅仅解读为个人的故事,相反,这部小说和电视剧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读者看到了这是时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者和阅读者共同完成了行动,并各自赋予这一行动以意义。

是的,在政治秩序中,每个人都要慎重考虑行动与行动带来的后果。或者说,正是在政治秩序中,行动被放大,具有了沉甸甸的意味。在杨少衡的《风口浪尖》中,一开篇,张子清就面临严峻考验,是以身冒险,承担起本不需要他承担的责任还是闪躲过去?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杨少衡始终把视线聚焦于试图有所作为的基层官员在官场生态环境中所遭遇的两难选择以及由此导致的诸种发展与精神困境。”当我们一步步走进张子清等基层官员的心灵深处时,我们愈发理解了他们,所以,当他们选择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时,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是极为艰难的一刻,行动向我们展现了它自身。

与杨少衡同为福建作家的须一瓜对台风也有类似的敏感。她的故事发生在台风肆虐的时刻,小说就叫《双眼台风》。傅里安是行动派,当他认定了当年办理的案件存在诸多疑点时,他毫不犹豫地行动,必须要寻找迟到的正义。美女神探鲍雪飞也是行动派,她必得千方百计阻止案件大白于天下。于是,行动与行动撞击成璀璨的火花,我们像看两大高手对决一般,被行动搞得眼花缭乱。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行动的正义终将到来。这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 行动即自我

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清,我们的行动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或许是一个意外,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到底是行动之后的“我”是真实的“我”,还是行动之前的“我”是真实的呢?这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鲁敏的《奔月》就讲述了“逃离”这一行动所改变的“自我”。那么,借车祸而来的逃离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鲁敏早就在小说中揭开了谜底:“出游是偶然的,更改路线是偶然的,车祸是偶然的,被抛到车子下方而非上方,那勾人魂魄的黑水,包括被黑水所吞噬的女人,皆是偶然的。还是说,这一切,只是披着偶然的外套,其实就是顽皮的必然性之本身?……事情后半部分的走向,并非像买一根棒棒糖那样只是临时起意,事实上,它们一直埋伏在她体内。从小到大,她都能感觉到

那份逃避的欲望,跟她的身体一起发育成长,好比长期的生理储备。”也就是说,看似偶然的逃离行动,其实还是必然。于是,我们看到小六从她原本的生活里滑落出去,在乌鸦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与之前的生活甚至别无二致。而她之前的生活秩序,仿佛有着惯性般自然而然地合上了,就像不曾有过小六这个人一样。也就是说,是逃离让小六成为了小六,也是逃离让小六失去了小六。听上去有些拗口,但这确实是鲁敏在《奔月》中所揭示的生活真相。

如果说,小六的行动一度给她的亲人们带来种种困扰和不安,同样为他人的行动所困扰的,还有梁光正的孩子们。在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里,她刻画了一个执著于寻亲的父亲形象。这个父亲热衷于讲述,更热衷于行动本身。他带动他的儿女们与他们一起行走在路上,寻找散落在原野的亲人们,寻找关于过去的闪亮记忆,其实也就是寻找他自己。梁鸿在“后记”里动情地说,“我和他一起下地干活,种麦冬种豆角种油菜,一起逃跑挨打做小偷,一起寻亲报恩找故人。我揣摩他的心理。我想着他如何在荒凉中厮杀出热闹,在颠倒中高举坚持他的道理,看他如何在无限低的生活里,努力抓住他终生渴望的情感。”那一刻,我也被深深打动了。我们所有的行动,逃离也好,寻找也罢,其实都是在一笔一划地描摹那个蒙昧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自我”。这个“在生活的暗处生出光来”的梁光正,其实是在以种种啼笑皆非的行为确证他自己。

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名为“心灵”,其实也是一个关于“行动”的故事。大姨妈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几十年,几乎赶上了每一个关卡的变化,亲身体验了在每个重要变化发生之时生活的混沌、无序,这么说吧,她应该算得上是变化所付出的“代价”。从北京到河南,从国企职工到分享艰难,从陷入传销的泥沼到转信基督教,结婚,生不了孩子,离婚,这就要大姨妈一生的简史。在许多许多人通过变而变得更好的时候,她远远甩在后面。每一次,她都努力想跟这个时代同步前进,但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直到陷入绝望。大姨妈一直在行动中,但似乎她的每一个行动都无人让人扼腕叹息。她刚一出场就是气功大师的忠实信徒,当还是孩子的杨麦都明明白白表示“不信这一套”时,大姨妈仍然执迷不悟,杨麦的父母更是认为大姨妈脑子坏掉了。到传销阶段,杨麦历经千难万险,在传销团伙里卧底找到大姨妈,想要带她逃离这一切的时候,大姨妈却坚决不愿配合,甚至让杨麦差点丢了性命。为什么对于显而易见的事实,比如气功、传销,大姨妈这么个好人却执迷不悟呢?小说中,石一枫不时让大姨妈向杨麦,也向读者倾诉,以期让我们理解她——“我的脑子是满的,但心是空的,我必须得相信什么东西才能把心填满。你说人跟人都一样,但为什么别人可以什么都不信,我却不能?我觉得心一空就会疼,就会孤单和害怕,我好像一分一秒也活不下去了,好像所有的日子全都白活了,好像自己压根儿就不配活着……我就想,信什么都无所谓了,关键得是先找个东西信了,别让心一直空着……”石一枫似乎在说,如果行动没有充满智慧的心灵作为向导,就会陷入一团混乱之中。或许是吧,我们在大踏步地行动之时,或许应该先成为一个思想者。

## 行动即命运

与《人民的名义》一样,严歌苓的小说《芳华》因为被搬上银幕而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对象。小说和电影的名字都叫做“芳华”,仿佛指向一代人洁白的青春,或者更为辽阔,指向社会主义精神遗产,但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小说曾经叫做《你触摸了我》,英文名还叫做“you touched me”,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部小说其实是关于行动及其后果的——一次“触摸”事件所带来的不同的命运。这个叫“刘峰”的男兵在行动中不折不扣地沿着“雷锋”的道路前进着,眼看着他也在收获雷锋的命运。然而,他遭遇到了爱情。这爱情主导着他,让他发生了“触摸”事件,转眼之间,一切都不同了。严歌苓残酷地认为,好人是不会得到爱情的。在感情的疆域,“好人”常常意味着乏味、无聊,无法唤起强烈的对等感情的人。说某人是好人,往往意味着你不想同这个人发生能量交换,不愿意回应他的感情。进一步,严歌苓将“好人”对好人的爱无能与“我们”对好人的认知联系起来。于是,像刘峰这样的好人在逻辑上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他一切都是虚伪的,都是在装作像一个好人一样生活,那么,他就是

了长篇小说《无言的结局》,中篇小说《审判现实》《不要电话拜年》等,并由虚构创作转型传记文学及游记随笔创作,出版图书20余种。仅2017年就有《柳宗元传》《儿女正当好年华》(与合著者)《地标文明足迹——西欧行》《话说红颜》《歪批诸子》5部作品出版。与会者认为,陈为人的创作扎根山西,贯通古今,将史料和对现当代电影、电视剧及其他文学作品的理解,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游刃有余。(晋文)

## 卢文丽诗集《礼》分享会在京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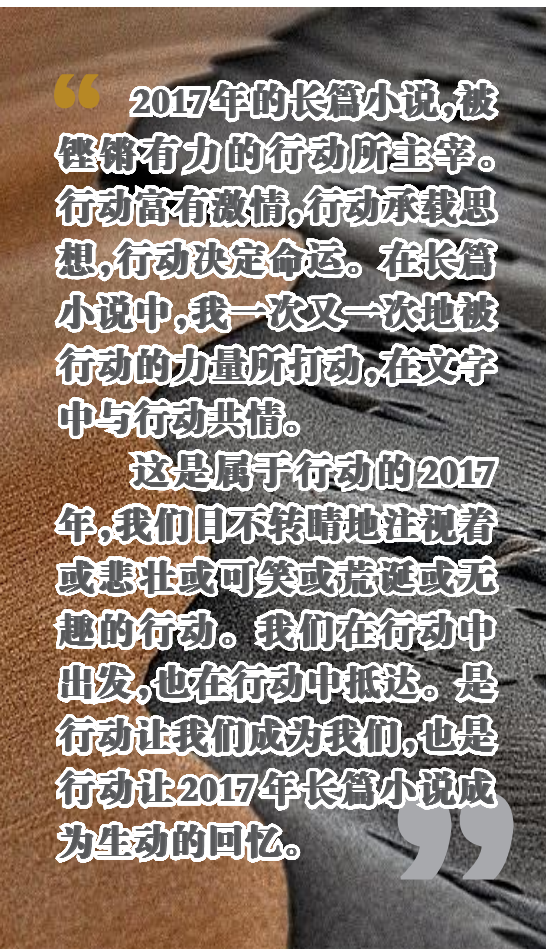
魂深处的敏锐与洞察以及对诗艺孜孜不倦的思索和探寻。

与会者认为,在喧哗的诗歌圈,卢文丽安静笃守诗歌的本真,将日常生活片段、独特的体悟理解,融入于她那特有的极富异趣的文字,诗风蕴涵内秀,语言轻盈灵动,传达出一种动人的美感,也铸就了其诗歌最为核心的凝重——那是一种对生

辨识出一颗诗心燃烧的历程。卢文丽的诗歌构造了一种诗歌中的远方,从自然山水到人文古迹,布满

了她夜莺般的吟唱,她的诗歌仿佛置在千里之外的雪山之巅擎起一把浪漫主义圣火,呈现出纯洁的冥想、高贵的独白和优雅的切分,保持了一种古典的身段和趣味。

“让诗歌成为礼物,是我久埋心底的心愿,它本身就是一桩风雅且美好的事情。”卢文丽说。(欣 闻)



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伪君子甚至比不上真小人。如果他一切都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那么,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而神是不会被认为是我们中的一员,更遑论与之产生感情。这就注定了,好人不会为刘峰的爱情带来加持,助其成功,反而会让其一败涂地。

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中的宋没用终其一生都在为一件事而努力,那就是“活着”。宋没用的生活穿越了动荡不安的历史,但并不开阔。相反,她的生活就是局限在她与身边少数几个人的交往之中。而这少数几个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她的亲人。对于她的亲人,不管那些人怎么待她,宋没用有一股子自虐般的牺牲精神,仿佛她活着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让她

的亲人活下去且活得好好。是啊,宋没用的世界就那么大,周边挤挤攘攘的都是她的亲人,父亲、母亲、哥哥、儿子、女儿。她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们,哪怕自己过得不好,也要尽自己所能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尽管她的力量是那么微弱。这是宋没用最朴素的人生哲学。而这人生哲学的基础又是如此简单——她和他们之间,血脉相连。他们在他们身上,看到她自己。

或许,在历史风云变幻的关口上,我们对行动之于命运的关系会看得更为清楚吧。叶兆言的《刻骨铭心》中,三个女人与他们的情感、婚姻的经历和历史牵连在一起,也和南京城的文化性格和表情连在了一起。其中,丽君写得最有声有色。这是一个时代新女性,时代流行什么,她就冲在时代前沿。她接连嫁了三个男人,革命者亚声、亚声的刺杀对象、首都警官学校的校长冯煊庭,在汪伪、中统和共产党之间不断切换旗帜,见风使舵的何为,最后丽君在凄苦的地底下死去。丽君的表妹碧如,相比之下生活就平淡很多,碧如的丈夫希严一直是生活的被动接受者,被时代的潮流冲到这儿或那儿。希严的爱慕者秀兰突然成为女明星,嫁给了戏剧家俞鸿之后又分手,嫁给了一个平民,过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动荡不安的,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这是时代赠予他们的礼物。

在李亚的《花好月圆》中,对李娃来说,误打误撞来到上海滩或许是一个偶然,但这个懵里懵懂的行为改变了他的命运。对于大小姐的痴恋简直就是李娃的信仰,这不是偶然,是必然,他必将在命运的点化下出生入死,马革裹尸。他必将在历史的书页中获得自己的名字,也获得自己的生命。

这是属于行动的2017年,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或悲壮或可笑或荒诞或无趣的行动。我们在行动中出发,也在行动中抵达。是行动让我们成为我们,也是行动让2017年长篇小说成为生动的回忆。

## ■关注

## 现代诗的经典化:过滤·净化·提纯

□陈仲义

现代诗接受的多端变频与海量产出特点,连同不断看涨的“自我推销”,使得现代诗的“可靠性”经常处于“游移”之中。故而现代诗接受的正常化与高质量实现,少不了要依赖不可或缺的经典化过程。现代诗的潮水般涨落总是比其他文类更加泥沙俱下,鱼目混珠,也由于接受中良莠难辨,薰莸同器,众多“误读”成为普遍“行规”而司空见惯,这就加剧现代诗接受不断要重临严峻环节——筛选与淘汰的反复工序,有如安装在自来水管道的过滤装置,经由各种软化、磁化、矿化、电解、膜分离手段,达到水质的净化、提纯。

现在,人们一谈起经典,几乎不约而同要提及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14种定义。通俗地说,经典就是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具有恒久的价值。时间(历史)长度几乎成了经典取舍的第一个尺度,但历史维度只是“金标准”的一半,如果历史维度加上空间维度(区域、流派、社团、风格等)的横向参数比较与“监控”,经典价值无疑增加了保险。但是,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合议庭”,最终授权还得回到读者的“陪审团”,确切地说,经典的确证,取决于历史化的庞大的陪审团的“裁决”。

新诗、现代诗,其经典化过程依然“山重水复”,十分吃力。经常是,遴选新诗、现代诗的经典尺度十分明确,当触到“边界”时却变得模糊;经典的内涵十分饱满,外延竟相当疏离;经典的理念不可撼动,但操作层面上却“节外生枝”。这或许可以归结为现代诗这一精灵鬼的刁钻习性:产量巨大,良莠难辨;多头标准,“范式”走样;超速喧嚣、频率过快,无以在短时期形成共享;尤其接受胃口多变,仁智各见,众口难调,导致相对主义到处泛滥。各种干扰因素:资本的、情谊的、权利的、程序的、观念的、话语的加入,造成种种波动与质变,这也是当代新诗、现代诗经典化反复折腾的重要原因。

中国新诗有不少所谓经典,因意识形式助力而鹤声四起,一时走红,但最终还得落入明日黄花的归途。历史文化权重大大超乎审美权重的不良后果,势必导致后来接二连三的“翻案”;长期被埋没的杰出文本(如穆旦《诗八首》),最后还是众望所归,重见天日。最有意思的是诗人的自我淘汰,铁面无私:1925年版《志摩的诗》收入《沙扬那拉十八首》,3年之后重印时,竟勇敢毙掉前面17首,只留最后一首,终成正果。同样,《康桥再会吧》再版时也被诗人果断砍掉,另作《再别康桥》——整整比《康桥再会吧》减少近五分之四篇幅。试想,要是徐志摩不对自己自戕自杀,“康桥”的流水还会流传至今吗?

有鉴于此,近年《扬子江诗刊》汲取经典“变数”的教训,努力进行一场重建经典的努力。例如对应于古诗十九首,它首开《新诗十九首》的筛选、甄拔。当时间积累到一定长度时,相信在各种经典“网眼”的筛选下,经典、准经典的“名单”有望更具说服力地浮出水面。现代新诗的经典化绝对不是简单的加减,它既是历史化过程,又是当代化进程。

一般而言,经典化主要通过三大渠道:教化普及、传播推广、遴选到位。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其中涉及诸多具体环节:选本、年鉴、教材、史料、奖项、教学等相互促进,形成各种分力的总和。其中,可能某几种分力过于羸弱,被某几种强大分力“吃掉”,可能某几种分力势均力敌,最后会取得某种妥协的“平均值”;可能某一个绝好的历史机遇,一下子凝集而迅速提升始料未及的价值效应,并且放大了结果;可能某一种权威机制,有意无意遮蔽了一个伟大的生命;也可能是萌芽中的经典,藏之“深山”,经过漫长的耐心等待、最终才熬出头来。有人会忧虑:过早、过分的当代化,因多种因素干扰,会冲击经典的真正形成。其实这些都是杞人忧天,我们要坚信历史的总体合力,具有自洽性的清洁能力,最终的经典化会越来越接近公正。

经典化有各种手段,多数时候采用的是模糊化的方式。近20年来,武汉大学王兆鹏团队发现定性分析容易产生某些偏袒弊端,遂改为较客观的计量分析。借鉴客观计量,排除“印象”、“感受”、“直觉”带来的人为争论,提供更令人信服的数据,作为有说服力的依据,比如文本进入视频次数、朗诵次数、选本次数、评论次数、教科书次数、学位论文次数、研讨次数、播送次数、转载次数、引用次数等等,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尽管当代时间流变短暂,量化数据积累单薄,琐细繁杂,不过只要有坐冷板凳的功夫,借助互联网技术,总会在资料与数据的实证中,避免主观干扰与非诗干扰。再比如引入相关的“大数据概念”,“一些数据,在传统观念看来与所要研究的问题可能毫不相干,但是许多不相干的信息在一起就会形成集成效应,会形成你所想象不到的因果关系和证据链。”将“因果关系和证据链”纳入经典化的“检索”系统,不啻是一个重要途径。具体可采纳的方法还有:函数(有序变化的关系);概率(随机发生的可能性数值);变量(无序变化中的频率、平均值、离散度);以及坐标、几何结构图形、表格等等。

经典化过程,参照温德尔·V·哈里森的理论概括,归结为7种功能:1.提供范本、理想和灵感,2.传播思想遗产,3.创造共同的参照系,4.作家与经典的互惠,5.将理论合法化,6.具有某种需要解释的历史化力量,7.起到了文化多元化的功能,而这些重要的功能似可聚集为霍布斯鲍姆的一句名言,即“发明的传统”。它通常呈现为一整套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形式化和仪式化特征;它标明了某种与过去的联系,但此种连续性往往是人为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变化了的新形势;它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中被植入了新的传统。

不妨说,经典就是否定与发现的传统,亦即发明的传统。这样的发明在闻一多《读骚杂记》中有一段妙语:“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如果说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可能会因时间愈久去事实愈远,那么真正的经典作品的接受史则恰恰相反,时间愈久,对意蕴的阐发则会愈丰富愈深入。……每一时代总能在过去的伟大作品中发现某种新东西。”它实际上涉及经典化的“动态管理”。这也是近年有关“批评的经典性重估”与“群选性的经典更新”的讨论。

古典诗语的经典化基本不成为问题,因为它早已拥有稳定的审美规范与接受规范。而现代新诗经典化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问题多多,笔者借此补充两条,也接受大家的批评:

一、现代诗经典化可同时建立两大流通渠道。一种是大众层面,呈现相对通俗、浅近的行色;另一种是精英层面,对应于有一定诗歌训练、具备前沿、尖端历练的“无限少数人”。由于大众与精英、通俗与先锋,已经无法同时满足两种差距甚大的胃口,故而现代诗经典化最好考虑在诗歌王国实行“一国两制”——构建大众版经典与精英版经典,这样的版图应该更符合诗歌的接受现实。

二、现代诗经典化受到时空的掌控。理想的愿景是:时间上,考虑经典的时间“刻度”须有所标示,像好酒的年代记号一样,比如得经历二三十年时段才能跨过“资格赛”,经历半世纪的才算“正式注册”,以此来杜绝各种“炒作”,和你追我赶的短效“排行榜”。空间上,则要确立越经历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共同认可,越具经典成色,以此为时间性多加一道保险。

## 况浩文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委员况浩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月28日在重庆逝世,享年88岁。况浩文,笔名林兰。中共党员。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一双绣花鞋》《风荷》,中篇小说《南岭之鹰》《麒麟花》《在茫茫的夜色后面》《企业家》,电影文学剧本《宝笈疑云》等。《一双绣花鞋》曾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及电影《雾都茫茫》。

## 傅汉清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南昌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傅汉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月22日在南昌逝世,享年77岁。傅汉清,笔名汉水。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强盗的儿子》,中篇小说集《九岭女杰传》《药王庙里疯女人》《何木匠招郎》,长篇报告文学《田野的呼唤》,长篇传记《杨杏佛传》等。作品曾获谷雨文学奖、全国第二届公安题材优秀作品奖等。

## 冯福宽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广播电视台退休干部冯福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月30日在西安逝世,享年79岁。冯福宽,回族。中共党员。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山花赋》《穆

林之歌》《黄土魂》《绿色的黄土高原》,散文集《回坊风情录》《艰难的脚步》,广播剧集《消逝在声音里的青春》《苍莽的高原》,长篇小说《大迁徙》《命运》《为了后世的天堂》等。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 西湖诗情暖京华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月30日,由浙报集团北京分社等单位主办的“西湖诗情暖京华——第13期浙报北京悦读会暨王毓诗歌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吴思敬、杨志学、苏军、吴重生等专家学者、诗人与会,围绕青年诗人王毓作品的特色展开交流。

王毓现供职于浙江杭州上城区文化馆,系《风雅上城》责任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首部诗集《她的日记》以星期一至星期日为序分为7个章节,共收录56首诗歌,记录了作者从一个10岁小女孩到24岁女青年的成长历程,透露出其奔放满怀又不失温柔婉约的性情。与会者认为,王毓的诗作真诚、自然、流畅,体现出对生活的思考和真挚的感情。她的作品以音乐入诗、以画入诗,富有音乐性和图画美,呈现出连绵起伏、五彩斑斓的瑰丽色彩。希望作者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开阔视野,努力写出更多既有深度内涵、又具诗性特色的优秀作品。

王毓表示,诗歌不仅是自己的书写工具,也是其所思所想的自然流露。“与其说我是在创作,倒不如说是和诗歌一起相处、一起经历生命,这种感觉非常美好。”

## 山西研讨陈为人近作

本报讯 1月30日,由山西作协主办的陈为人近作学术研讨会在太原举行。杜学文、汪兆骞、赵白生、郭娟等50余位学者、评论家、作家齐聚一堂,对陈为人的创作成果展开研讨。

传记文学作家、文化学者陈为人的创作生涯始于上世纪70年代,近年来更是笔耕不辍。他近年来接连创作

本报讯 2月4日,浙江女诗人卢文丽诗集《礼》分享会在北京举行,20多位诗人、评论家与会。

有“西湖女诗人”之称的卢文丽著有诗集《无与伦比的美景》《亲爱的火焰》《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散文集《沙漏的舞蹈》《温柔村庄》和长篇小说《外婆史诗》等。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诗集《礼》,荟萃了卢文丽30年来各阶段的代表性诗作179首,集中展示了诗人多维的生活轨迹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反映了一位女诗人灵